

◎创作谈

有人在战壕里写作， 有人在炸塌的剧场唱歌

张庆国



找不到健在的当事人采访，找到当事人的后代，他们也都年事已高，他们的讲述是历史事实，还是私人情感？

相比古代史，抗战史更近，资料也繁杂，怎么选择？经人介绍，我结识了一位杰出的抗战史学者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我用半年时间全面学习抗战史和抗战文化史，也学习了中国现代音乐史、戏剧史，世界出版史、文物知识等，我又购买了30多本人物传记，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与行为方式，也研究一些文化名人的性格和家族史，包括一些地方史和地方风物志。那半年我读得日夜颠倒，高度兴奋，理出一个写作提纲，确定了写作内容。

还有疑问，一部纪念抗日战争的非虚构作品要怎么写？单纯重现往事吗？历史著述早有史学家写过了，史料也有专家做过整理记录，作家的文学表达空间在哪里？很多历史现场已经改变或不复存在，我出行调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思考再三，一时理不清头绪，只明白一点，历史不能坐在家中写，要去现场观察，先上路再说。

我首先寻访七七事变起始地北京卢沟桥与宛平城，接着去天津南开大学。我在天津的老街寻找张伯苓故居，曾遭遇居民的阻拦，这没事，我理解，不容易就更有内容可写。我再去上海和江苏南京等地，用3个月时间，走遍中国15省份25地。我都坐火车，保持跟大地的接触，都挑靠窗的座位，一直在车上注视窗外山河的移动，捕捉窗外一晃而去的房屋和路边的人脸。

我一边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观察和体验，一边躺在陌生城市酒店的床上，面对头顶的黑暗，紧张思考，做

出并推翻各种写作规划。随着行走路线的延伸，我的思维渐渐清晰。我明白了两点：第一，我要用人物来架构这部书，这应该是一部描述人物生命史的作品，我不能写那种见事不见人的文字；第二，我认为外出调查很重要，必须到达所有将写到的现场，但我不应该止于调查，我行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，是积累令人寻找时间的体验，我的写作，是一段时间跟另一段时间的相互注目。

我有事做了，我把出行做田野调查的行程、坐的车、吃的饭、住的旅馆、见到的人和如何见到这个人，以及调查途中我的感情和思想活动记下来。在南京长江边的浦口火车站，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，用手机写了一小时，记录下现场的建筑、行道树、商店、江水、轮船的汽笛声、路人的姿势表情以及我的思想和情感活动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街头，我找不到椅子，坐在街边的石墩上，也在手机上写了半小时。在广西河池寻访浙江大学西迁遗址的荒园，我请带路的朋友在车里等，自己站在荒园门口的阳光下，现场记下几百字。我每天晚上回到酒店，赶紧打开电脑，写采风日记，把手机上的文字取出来，再写下当天所见。搜索现场的心情，回味和思索当天行动中的思想震荡，经常持续到半夜。纵贯整个中国的寻访调查结束，我写下了15万字的采访日记。

于是，我后来写作的文本中，出现了两条叙述的河流，一条是历史事件，宽阔的记忆之河，一条是纤细的现实之水——穿越中国行走的“我”。我用文学的方式来描述记忆之河，也用细致的文学描述写下现在

“我”之所见所思，“我”与历史隔着时间大河对望，拓宽了文学艺术的时空。

这是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，单纯地重述历史是一种平面写作，写历史的同时，再写今天的“我”，层次会丰富。“我”在中国行走万里寻访历史现场的经历，也是书中的重要内容，“我”的视角和目光，“我”的行动，在全书的文本中与抗战时期张元济、梁思成、穆旦、冼星海等文化人的活动相互注视，整部书的叙述就呈现出立体效果，变成复调式表达，这种写法应该更好。

我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向人类文明致敬，我的文字是向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继续文化工作、并为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文人表达遥远问候，是为了探究他们社会情怀的宽度、深度以及文化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。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生活内容，一方面它传授知识，教人研习前人的智慧，创造更好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它还塑造强大的人格，给人注入超越物质生存需求的精神力量，教人目光远大，具有社会责任感，无私、善良和高尚。

中国传统崇文重教的传统，文人治国的历史很长，孔子供在庙里接受人们顶礼膜拜，城里有文庙，乡下的魁星阁还供个持笔的神仙，读书受到高度重视。立德立功立言，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“三不朽”。现代社会文化多元，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于精神修炼之外的文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调动最好的艺术手段，追溯抗战时期中国文人舍生忘死工作、并坚持为社会服务的历史切片，对后人会有启发和激励，把这些写出来，也算我一份微薄的文化贡献。

杨
鸥

回荡在三峡间的抗日壮歌

——读叶梅长篇小说《神女》



实可感。

作品在书写这场战争的同时，也写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他们中有巴东县长于良仲这样正直的官员，也有邮政局长尤占坝这样险恶的小人、赖成绪这样发国难财的黑帮人物，也写出了普通百姓的苦难与顽强，展现纷繁复杂的社会众生相。

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。”这两句我们熟悉的诗写的就是这个地方。书中展开了一幅三峡人家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卷，土家族的吊脚楼、龙船调，还有过赶年的习俗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。三峡普通人家的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，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与这片土地血肉相连。这里也是叶梅的故乡，她以浓厚的乡情、深沉的爱，展现家乡人、家乡事、家乡的英雄史诗，让书中的人物和故事令人如此难以忘怀。战争破坏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对和平安定的美好向往，更衬托出战争的残酷。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深入思考。

浩荡的长江赋予叶梅大情怀，万千风云在她胸中激荡，化作她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。在壮美三峡间回荡的这曲动人心魄的抗日壮歌，在今天，依然不绝如缕。

为大国工匠立传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逆境中绽放——杨辉素《卢仁峰：为国铸“剑”的独手焊工》新书分享会在河北文学馆举行。该书讲述了“大国工匠”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卢仁峰的奋斗历程，细腻呈现新时代大国工匠的精神世界。

与会嘉宾认为，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将客观叙事与文学性描绘有机融合，实现了技术细节展示与精神内核挖掘的双重突破。在叙述节奏上，作品张弛有度，既呈现主人公攻克技术难关时聚精会神、近乎

“神助”的职业魅力；又描绘了攻关成功后师徒间独特的欢庆场景，展现温情细节。作者注重多侧面塑造人物，通过徒弟的视角，生动呈现卢仁峰甘为人梯、言传身教、无私奉献的高尚人格。

中国工人出版社社科文艺分社策划编辑陈培城介绍，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中国工人出版社联合开展“文艺工作者走基层”活动，计划推出“大国工匠人物传”丛书3辑45册，以文学为媒，弘扬工匠精神。



兼具科学观察与诗意图表达 ——读阿来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大河源》

张傲 张凡

识性写作的方式进行了精准描摹。与此同时，阿来的文字中蕴藏着灵动的诗意，他写初寻黄河源时遇到的景象是“风从天上撕扯下来那么多云雾，一下就把山头和一行人包裹起来”“低头，看见脚边青草间蹦跳着颗颗雪”。阿来赋予自然之物人的性灵与情感，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意。通过对风的“撕扯”及其对人的“包裹”等拟人化笔法，展现了风的肆虐与压迫，勾勒出风雨骤至、天地混沌之象。而“蹦跳”一词，则使雪变成在青草间欢快地跳跃嬉戏的小精灵，打破了风雪带来的压抑感。在众多关于黄河的书写中，《大河源》宛如“黄河大合唱”中一个独树一帜的声部，以其特有的旋律与节奏，奏响了科学与文学的和鸣。

《大河源》也是一部传统与现代共生的深情传记。作者以“吾土吾民”的情怀，溯源黄河源头，唤醒历史记忆，挖掘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象征意义。他在书中广泛援引黄河源头地区丰富的县志史料、严谨的

考古资料、珍贵的史前石刻以及浪漫的诗歌神话等，找寻古老黄河的青春容颜与鲜活记忆。通过对宗日文化、马家窑文化、齐家文化、卡约文化等黄河源区古文化遗存的书写以及对茶马互市、汉藏和亲、古驿道开辟等史实的论述，阿来论证了自古以来多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事实。此外，阿来还以现代眼光审视当下，对生态保护提出建议。《大河源》既钩沉历史记忆，又洞察时代症结，不仅是黄河历史文脉的记录，更是一部具有现代意味的生态启示录。

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，可以说是近年来阿来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。《西高地行记》《去有风的旷野》等散文游记，实地踏勘自然，感悟人情物理，在行走中体悟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。《云中记》等小说，通过艺术想象构建人与自然的互动场景，展现灾难面前人与自然力量的博弈。《大河源》是这一创作脉络的延续，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说：“对人的反省，是《大河源》最有价值的问题意识。”在

这部作品中，阿来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模式，秉持众生平等的理念，以饱含温情与诗意的笔触，对黄河源区的湖泊、草甸、高山、花鸟、树木等自然万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呈现。在作家的认知里，“这个世界，是人的世界，也是所有生命共生共荣的世界”。他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，将人类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中，引我们重新思考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。在此意义上，《大河源》是一部具有生态思想启蒙意义的作品，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一部力作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）

河南推动豫籍文艺名家“归根还巢”

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活动中说，乔叶及其作品“底蕴醇厚、宝水如镜、气质率真”，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创作中、在“跑村”“泡村”的实践思考中，坚持与时代同步步伐，其文学书写具有丰沛的情感。希望以乔叶研究中心成立为契机，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。

乔叶是当代作家，出版有中篇小说《最慢的是活着》，长篇小说《认罪书》《藏珠记》《宝水》，散文集《深夜醒来》《走神》等，曾获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。多部作品被译介到俄罗斯、西